

論中國語言學

周法高著

論中國語言學

周法高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論中國語言學

著 者： 周法高

出版者：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者： 聯藝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196號四樓

一九八〇年初版

國際統一書碼：962-201-226-4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自序

這本小書包括以下四篇：

一、論中國語言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就職講演，一九六六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二、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一卷（一九七三）。

三、漢語研究的方向——語法學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語言學研討會，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行。

四、漢字整理問題，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傅孟真先生八秩晉四誕辰紀念會講演詞。

第一篇是一九六五年春天我在中文大學的就職講演，那一次是由李卓敏前校長作主席。第二篇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講演稿，那時由李前校長兼代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我主持的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也是由李前校長贊助創立的。在此謹表示我對他的感謝與懷念之忱。第三篇，本是一篇講稿，由何大安先生記錄。我徵得李壬癸先生的同意，將他所補充的兩千多字也收了進來，又蒙歷史語言研究所同意將這篇講稿收進本書，在此一併致謝。至於其他幾位先生的發言就從略了。第四篇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傅孟真先生八秩晉四誕辰紀念會講演詞。傅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就讀時的代理所長（當時所長是胡適之先生），又經手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是我非常敬佩的。

我從事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已有四十年了，出版的著作也有六百萬言。不過我深深地感覺到深入淺出的通俗文章很難寫，也很需要。我在二十五年前寫的一本小書「中國語文研究」大約已銷了一萬多本，日本京都朋友書店並且有影印本。這本小書正好補充前書的不足，作為入門的普通讀物。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黎明先生籌劃將本書出版，謹致謝忱。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法高序。

目 錄

論中國語言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1
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	21
漢語研究的方向——語法學的發展	45
漢字整理問題	59

論中國語言學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

一、解題

所謂「中國語言學」，有廣義和狹義的分別。廣義的「中國語言學」包括中國境內各種語言；狹義的則專指「漢語語言學」而言。這裏，我是專指「漢語語言學」而言。

過去我們不用「中國語言學」這個名稱，而把研究中國語言文字的學問叫做「小學」。習慣上以「字」為研究的單位。「小學」的內容，包括字形、字音、字義三方面；或者可以說是包括文字、音韻、訓詁三方面。民國以來有人把「小學」改稱「文字學」，例如北京大學就有文字學音篇、文字學形義篇的講義。不過這個名稱也有含混的地方，因為也有的大學把「文字學」專指講字形的學問，例如1940年左右對日抗戰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裏便開有「文字學」、「古文字學」的課程。這麼說來，「中國文字學」也具有廣狹二義。

有人認為：傳統的「小學」或「文字學」只是屬於 philology（譯作「語文學」）的範圍，和 linguistics（譯作「語言學」）的性質不同。例如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的「前言」中說：

「大家知道，語文學 (philology) 和語言學 (linguistics) 是有分別的。前者是文字或書面語言的研究，特別着重在文獻資料的考證和故訓的尋求，這種研究比較零碎，缺乏系統性；後者的研究對象則是語言的本身，研究的結果可以得出科學的、系統的、細緻的、全面的語言理論。中國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語言研究，大致是屬於語文學範圍的。」（中國語文 1963 年 p. 232）

可是，他的中國語言學史卻把二千年來「語文學」的研究都包括在內，

由此可見：他所謂「語文學」和「語言學」的劃分，有時也相當含混。我在這裏講到過去的中國語言學，也是採取比較寬的標準的。

不過，有一點我得提出來請大家注意的就是：文字只不過是語言的代用品，我們過去所謂「小學」或「文字學」，除了研究文字形體一方面的是屬於文字的範圍而外，其音韻、訓詁兩方面研究的對象是語言，而不是文字本身。我們只是通過文字的媒介而研究語言罷了。我們把研究語音、語義的學問歸到文字學裏是不妥當的，而且和單講字形的文字學也容易相混，似乎用「小學」或「中國語文學」的名稱要好一點。

還有一點需要聲明的：所謂「中國語言學」，研究者並不限於中國人，我們在討論中國語言學的過去和現在時，要把眼光放遠大一點，不能只注意到中國人自己的研究，而忽略了外國人的研究。

此外，我的題目雖然和中國語言學史很有關係，可是我在這裏，由於時間的限制，只能講一個粗枝大葉，而不能作細節的討論，關於中國語言學的未來，我也不是預言家，不能未卜先知，我只不過把我所認為今後語言學界應該做的工作提出一些來，供大家參考罷了。

二、傳統的中國語言學的特點

我在這裏將講到五四運動以前傳統的中國語言學研究的一些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重實用。從歷史上看，中國民族喜歡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不大長於做純理論的研究。這一點在語言學方面也不例外，研究小學的目的是爲了通經，通經是爲了致用，至於那些字書、韻書、韻圖之類是爲了實用的目的，那是自不待言了。有人指出，漢以前的思想家如荀子雖然有一些觸及到語言學方面的理論，可是並不是專門討論語言的。漢末劉熙的釋名想用聲音相近的字來解釋事物得名的起源，例如開頭第一條便說「天，豫司竟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釋天）這種純粹主觀的解釋法，雖然也構成一套系統，可是有很多是不可靠的。反而不如荀子正名篇的話：「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

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合乎現代語言學的理论¹。不過，二千年來，荀子的語言理論不大爲人所注意，而聲訓家的說法卻流行在傳統的語言學界中²。

第二個特點是重視對古代的研究。研究小學的目的既然是爲了通經，因而小學成爲經學的附庸，而重視對古代的研究³。假如我們統計一下歷代小學的著作，便可以看出多數的著作是考究古代的。就拿音韻學來說吧，清儒對周秦古音的研究可以說是如日中天，盛極一時。對於研究唐宋的韻書的卻叫做「今音」⁴；可是對於研究當代方音的卻是寥若晨星。研究當時方言俗語的，往往著重語源的推求，例如清翟灝的通俗編、錢大昕的恒言錄，以及章炳麟的新方言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要想像漢代揚雄方言那樣記錄當時的方言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了，反而流傳在民間的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方音韻書，如廣州的千字同音、汕頭的潮聲十五音、漳州的十五音、泉州的彙音妙悟、福州的戚林八音和正音通俗表、徐州一帶的十三韻、徽州的鄉音字彙等等⁵，這些書都是爲了民間實用的目的而編寫的，爲舊日的士大夫所不取。

第三個特點是重視文字。由於中國語言是單音節性的，分析的（缺

1 趙元任語言問題（1959年台灣大學出版）p. 3說：「語言跟語言所表達的事物的關係，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約定俗成的關係；這是已然的事實，而沒有天然、必然的關係。」他用荀子的「約定俗成」四個字來說明語言的性質，是合乎荀子的意思的。

2 章炳麟國故論衡上卷語言緣起說云：「語言者，不馮虛起，呼馬而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稱也。……何以言馬？馬者武也。何以言牛？牛者事也。」便是一例。

3 清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說：「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張之洞說文解字義證序說：「治經貴通大義，然求通義理，必自音訓始；欲通音訓，必自說文始。」

4 清江永古韻標準例言：「古韻既無書，不得不借今韻離合以求古音。」

5 參羅常培漢語方音研究小史，見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1963年），p. 152。

少語形變化)，所以中國文字發展到了諧聲的階段，便不能進一步走上拼音文字的途徑；而西方卻由象形文字變成了拼音文字，這一個發展是適合中國語言的特性的⁶，由於此一特殊的發展，便决定了二千年來中國語言學研究重視文字的特點。「小學」是研究字形字音字義的學問，我們可以用今日各種不同的方音誦讀二千年前的古籍，說各種不同方言的人卻可以用同一的文字來表達意思，由於文字的統一而促成了國家的統一，這不能不算是一種方便，可是缺點就由此而發生了，在接受西洋的拼音方法以前，我們沒有一個簡單而正確的標音的方法。反切也不能給我們一個正確的標音，因為我們讀字的音是隨方音而異的，這樣，使我們對中國語音史的研究便發生了很多困難。在研究語義方面，也往往為文字所拘束。清代小學家的成就所以能够超越前代，便是由於他們能够脫離文字的束縛⁷。不過，有時也不免濫言通假而發生了好些錯誤。

第四個特點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而加以融會貫通。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曾經有兩次大規模的接受了外來的影響：

A 第一次是印度佛教的影響，西域和印度用的是拼音文字，特別是印度的梵文字母也隨佛教而傳入了中國。漢末反切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可能有關係⁸，南朝文士所提倡的聲律論也可能和佛經轉讀有關⁹，隋陸法言的切韻和唐玄應的一切經音義¹⁰ 審音的精細，也可能間接受了和尚們的影響。至於唐守溫的字母和後來的三十六字母，以及宋以後的等韻圖，那更確切的是受了佛教影響後的產物了¹¹。

6 參高本漢中國語言學研究中譯本，p. 32；周法高中國語文研究，p. 119。

7 王念孫廣雅疏證自序：「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

8 參周法高佛教東傳對中國音韻學之影響（1956年發表），見中國語文論叢（1963年），p. 31—35；王力中國語言學史第六節，見中國語文 1963年，p. 319—322。

9 參陳寅恪四聲三問，見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10 參周法高玄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冊（1948年），p. 359—444。

11 參周法高佛學東傳對中國音韻學之影響，中國語文論叢，p. 42—46。

B 第二次是西洋的影響。從明朝末年（十七世紀）耶穌會士用羅馬字來拼中國語；十九世紀以來，西洋的傳教士和外交家們更不斷地研究中國語言。五四運動（1919年）以後，更接受了西方現代語言學的影響，而有了歷史語言學和描寫語言學的研究。另一方面清代著名的小學研究，從江永戴震這一派才開始發揚光大起來，而江戴天算之學都受了西洋的影響，此外還有錢大昕、阮元等，有人認為這可能影響到他們治學的精神和態度，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的¹²，直到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章炳麟，其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更接受了外來的影響，他解釋六書中的轉注（許慎說文解字叙云：「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說：類謂聲類……首者今所謂語基」（國故論衡上卷轉注假借說），他所謂「語基」，現在叫做「語根」，相當於英文的 root。他又著了一部文始，更發揮「語根」的學說，他所著的語言緣起說（國故論衡上卷）更利用「語根」的說法來推測語言的緣起。這種學說分明是接受了十九世紀西洋語言學的影響¹³。此外他在駁中國改用萬國新

12 王力中國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見中國語文 1962年，p. 437）說：「徐光啓把西洋的天文曆算介紹到中國以後，許多經學家都精于此道，最值得注意的是江永、戴震、錢大昕、阮元等。據張之洞書目答問所載，江永在天算中屬於西法，戴震、錢大昕、阮元屬於中西法。（原註：『孔廣森也著有少廣正員術內外篇……，朱駿聲也精於天文曆算。』）江戴等人經過近代科學的天文曆算的訓練，逐漸養成了縝密的思維和絲毫不苟的精神，無形中也養成了一套科學方法。拿這些應用在經學和小學上；自然跟從前的經生大不相同了。」

13 俞敏論古韻合帖屑廢曷五部之通轉，（燕京學報第三十四期，p. 30）說：「章氏造文始，自言讀大徐所得（荊漢微言），夷考其淵源所自，實出于德人牟拉（Max Müller）之言語學講義（*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1871）。持國故論衡之語言緣起說後半以與牟書第二編中論語根之語相較，承沿之迹宛然。其檢論訂文篇附錄正名雜義云：『馬格斯牟拉以神話為言語之癭疣』，亦即牟書中語也，牟氏常取印歐語之根，歷數其各語系中之變形，章氏取之。其說轉注云：『類謂聲類，首謂語基』是也。」

語說（見太炎文錄別錄卷二）一文裏定的「紐文」和「韻文」雖然是採用篆文，實際上是受了日本「假名」的影響的，民國元年（1912年）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次年正式開會，採用章炳麟所擬的「取古文篆籀逕省之形」的原則，製定三十九個注音字母¹⁴。由此看來中國語言學研究善於接受外來的影響，而加以融會貫通，從章炳麟的學風也可以看得出來。

以上舉出傳統的中國語言學的四個特點，以下將討論到中國語言學史的分期和各期的概況。

三、中國語言學史的分期及各期的概況

現在將中國語言學史分爲下列數期：

1. 上古期，先秦到漢末（公元前三世紀左右至公元後三世紀初）；
2. 中古期，漢末到五代（公元三世紀初至十世紀末）；
3. 近古期，宋到明末（公元十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
4. 近代期，明末到民國初年五四運動時期（公元十七世紀初至二十世紀頭二十年）；
5. 現代期（1920年左右至今）。

現在將各期的概況分述如下：

1. 上古期。漢以前的一些思想家（特別是荀子）對語言有一些零碎的意見，可是還不够成爲完整的系統。到了漢代經學昌明起來，便出現了好些重要的小學書，其中以西漢初年的爾雅，西漢末年揚雄的方言，東漢初年許慎的說文解字和東漢末年劉熙的釋名爲最重要，爾雅、方言和釋名，公認爲訓詁學方面的三部寶典，而說文解字則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字典，公認爲研究中國文字的寶典，爾雅一書收集古書中的訓

14 參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1934年）卷二，p. 75—93；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1963年香港版），p. 335—336。

詁，羽翼六經；方言則開創了中國方言學的新紀元；而釋名，則是主觀地解釋事物得名的來源。至於說文一書，本不限於文字形體方面，其諸聲系統為研究周秦古音最重要的材料；在訓詁學方面也有崇高的地位，其有功於經學更是不必細說了。

2. 中古期。自從漢末發明了反切的方法，用兩個漢字來標音，上一字代表聲母，下一字代表韻母。這種方法代替了過去直音和譬况為音的辦法，實在是一大進步。從魏李登聲類、晉呂靜韻集以後出現了一系列的韻書，到了隋陸法言的切韻，更是集其大成。在字書方面也有晉呂忱的字林和梁顧野王的玉篇。在訓詁方面，也有魏張揖的廣雅等書以及唐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而和尚們也寫了好些佛經的音義，最著名的有唐朝玄應的一切經音義和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在唐末更出現了守溫的字母¹⁵。

3. 近古期。這一期的等韻圖非常發達，相當於現代的拼音字表。在韻書方面也出現了大宋重修廣韻和集韻等書，是繼承切韻的系統的。此外，還有金代韓道昭的五音集韻，元代黃公紹的韻會，明初的洪武正韻等書，最突出的一部描寫元大都（今北平）的方音的是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此外，在文字學、古文字學、古音學、訓詁學諸方面，也有不少的貢獻（詳見下節）。

4. 近代期。這一時期的發展可分兩方面來說：

A 清代經學復興，小學的研究也突飛猛進，超越前代。周秦古音方面，明末的陳第（毛詩古音考成書於 1606 年），清初的顧炎武，中間經過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等，直到民國初年的章炳麟、黃侃，都有不少的貢獻。在隋唐韻書的研究方面，以陳澧的切韻考貢獻最大。在訓詁學方面，以高郵王氏父子、郝懿行和俞樾、章炳麟等的貢獻為最大。王念孫著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

15 參羅常培敦煌寫本守溫韻學殘卷跋，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1931 年）；重印在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p. 200—208。

他的兒子王引之著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郝懿行著有爾雅義疏，俞樾著有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他的弟子章炳麟著有文始、新方言、國故論衡上卷諸篇。在文字學方面，說文研究，最著名的有段玉裁、桂馥、朱駿聲、王筠等，在丁福保的說文解字詁林裏就收了二百多家。在古文字學方面：金文之學如阮元、徐同柏、方濬益、吳大澂、劉心源、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都各有貢獻。甲骨文從 1899 年發現了以後，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都作了開山的工作。

B 另一方面，從明朝末年起的，西學東漸，西洋的傳教士和外交家寫了不少研究中國語言的著作（這一切將留在下一節去敘述）。到了 1898 年，馬建忠受了拉丁語法的影響，寫成了一部馬氏文通，為第一部中國人寫的有系統的語法書。

5. 現代期。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語言學便走上了一條新的途徑，現在分門別類的敘述在下面：

A 歷史音韻學。法國的馬伯樂 (Henri Maspero) 在 1920 年發表了唐代長安方音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載河內遠東法文學校學報 BEFEO 第二十期) 一篇長文，瑞典的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從 1915 年到 1926 年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國音韻學研究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有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中譯本，1940 年)，以高氏的貢獻為最大，他參用反切、韻表和現代方言三種材料交互證明，對於切韻的語音有很詳細的構擬。關於「重紐」問題，那格爾 (Paul Nagel, 文見通報 1941 年)、董同龢和周法高 (二人文見史語所集刊第十三本) 都對高氏的構擬有所修正。高本漢進一步又根據切韻音和清人的成績構擬周秦古音，著有詩經研究 (*Shi King Researches*, 1932 年) 等文，西門華德 (Walter Simon, 文見 *Mitt. Sem. Or. Spr.* 30, 1927 年) 和李方桂 (文見史語所集刊第三本第五本，1931 年至 1935 年) 又加以修正。董同龢著有上古音韻表稿 (史語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 年) 和中國語音史 (1954 年)。浦立本 (E. G. Pulleyblank) 也著文討論古音 (文見 *Asia Major*, 1962, 1963)。羅常培和周祖謨著有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第一分冊，兩漢部分，1958 年)。龍

果夫 (A. A. Dragunov) 著有八思巴字與古漢語 (*The h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 載蘇聯科學院人文科學部報告, 1930年; 1959年有中譯本)。在音韻學的資料方面, 劉復編有十韻彙編 (1937年)。

B 語法學方面。黎錦熙著有新著國語文法 (1924年), 楊樹達著有高等國文法 (1920年), 受了外國語法教科書的影響。呂叔湘著有中國文法要略 (1942年), 採用了葉斯卜孫 (Otto Jespersen) 的學說; 王力著有中國現代語法 (1943年)、中國語法理論 (1944年), 採用了葉斯卜孫和布倫非爾特 (Leonard Bloomfield) 的學說; 高名凱著有漢語語法論 (1948年), 趙元任著有國語入門 (*Mandarin Primer*) 的導論 (1948年, 有李榮中譯本, 書名北京口語語法, 1952年); 又著有中國話的文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1965年加州大學出版), 是一部劃時代的描寫現代國語的巨著。丁聲樹等著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 (1961年), 是大陸出版的語法書中較好的一部。周法高著有中國古代語法三卷 (1959至1962年), 是一部講古代漢語 (上古到隋) 的歷史語法。太田辰夫著有中國語歷史文法, (1958年), 着重六朝以後的語法現象。杜百勝 (W. A. C. H. Dobson) 著有晚周語法 (*Late Archaic Chinese*, 1959), 周初語法 (*Early Archaic Chinese*, 1962) 和東漢語法 (*Late Han Chinese*, 1965), 是三部描寫的古代語法; 哈里迪 (M. A. K. Halliday) 著有元朝秘史語法一書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1959), 是一部描寫的元代官話的語法。

C 方言學。第一次大規模的調查一系列的方言的著作是開始於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 (1928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28年成立以後, 進行大規模的方言調查。羅常培著有廈門音系 (1930年)、臨川音系 (1940年); 趙元任著有鍾祥方言記 (1939年)、台山語料 (史語所集刊第二十三本, 1951年); 董同龢著有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 (史語所集刊第十九本, 1948年); 四個閩南方言 (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一本, 1959年)。又趙元任等著有湖北方言調查報告 (1948年)。研究古代方音的有羅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 (1933年)¹⁶。此外, 研究

方言的實驗語音學的有劉復的四聲實驗錄 (*Etude expérimentale sur les tons du chinois*, Paris, 1924), 王力的博白方言實驗錄 (*Une prononciation chinoise de Po-peï (Province de Kouang-si) étudiée à l'aide de la phonétique expérimentale*, Paris, 1932), 白滌洲的關中聲調實驗錄 (史語所集刊第四本, 1934) 等。在方言語彙方面：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後面附有方言字彙 (1928年)，列了二十六處的方言；北京大學語言學教研室編有漢語方音字彙 (1962年) 列了八個方言區的十七處方言；又編有漢語方言詞彙 (1964年)，列了十八處方言。近年來大陸出版了幾部分省的方言報告：如江蘇方言概況 (1960年南京)、四川方言音系 (載四川大學學報, 1960年)、河北方言概況 (1961年, 天津)。總論漢語方言的有袁家驊等的漢語方言概要 (1960年)。

D 訓詁學。高本漢著有漢語詞類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4年；張世祿有中譯本, 1937)。沈兼士著有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 (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1935年)。都是探究中國古代語源的文章。楊樹達著有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 (1955年有增訂本)、詞詮。張相著有詩詞曲語辭匯釋 (1953年)。

E 古文字學。關於說文方面丁福保編有說文解字詁林 (1928年) 和補遺 (1932年)，匯集了清代研究說文的成績。在金文研究方面，有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容庚、于省吾、唐蘭、楊樹達、陳夢家等；甲骨文方面，有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于省吾、唐蘭、陳夢家、胡厚宣、屈萬里、張秉權、饒宗頤等，日本的島邦男、貝塚茂樹、白川靜等。編字書的有容庚 (金文)，商承祚、孫海波、金祥

-
- 16 上面所舉，因為篇幅的關係，只限於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至於其他機關以及外國人對中國方言的研究，參看羅常培漢語方音研究小史，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p. 155—156；董同龢近三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載學術季刊一卷四期，1953年；董同龢中國語音學和音韻學的最近研究 (*Recent Studies on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in China*)，載 *Phonetica* 第六卷 (1961年) p. 216—221。

恆、李孝定等(以上甲骨文)。通論的有唐蘭的古文文字學導論(1953年)。

F 總類。高本漢著有中國語與中國文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1923; 1962年香港大學重印; 有張世祿中譯本), 中國語言學研究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1926年; 有賀昌羣中譯本), 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1949; 有杜其容中譯本, 1963年), 漢文典 (*Grammata Serica*, 1940), 修正漢文典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1957); 法里斯特 (R. A. D. Forrest) 著有中國語言通論 (*The Chinese Language*, 1948); 周法高著有中國語文研究 (1955年); 王力著有中國語文概論 (1939年), 漢語史稿 (1957年至1958年), 中國語言學史 (中國語文 1963年第三期至1964年第二期)。

四 關於中國語言學史分期的討論

關於中國語言學史的分期，王力曾有所討論。他說：

「我們把中國語言學分爲四個時期，其中只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漢代到1898年，……第二階段從1899年到1949年，……這兩個階段在學術的觀點方法上是那樣迥然不同，所以二者之間的界限是黑白分明的。」(中國語文 1964年 p. 104)

他把第一個時期叫做「訓詁爲主的時期」，包括漢代，附帶也討論到先秦；第二個時期叫做「韻書爲主的時期」，從漢末到明末；第三個時期叫做「文字、聲韻、訓詁全面發展時期」，從清初到1898年；第四個時期叫做「西學東漸時期」，從1899年到1949年。

這種分期法是有缺點的，我們首先得注意中國語言學史是中國文化史的一環；其分期雖然不一定要和中國歷史的分期一致，但是，在必要的時候也要顧到其相關性。第二，假如沒有甚麼特別的理由，我們不應該把其中的任何一期分得太長，以免有輕重失調的毛病。

王力的分期，有下列幾項缺點：

第一，第二期分得太長，和中國史的分期也不合，他忽視了宋代在

語言學史上的地位，而把它和唐代以前混在一起，攙統的舉出第二期爲「韻書爲主的時期」。他說：

「第二時期是佛學與理學時期，在這一時期，經義雖也還算重要，但是主要不在于字義的辨析，而在于章句的闡述，于是語言學的重點移到音韻學上，跟文學上的聲律、哲學上的佛教相配合。」

（中國語文 1964 年 p. 104）

他明明知道宋元明是理學興盛的時期，和唐以前迥然不同，爲甚麼不把宋元明單獨劃成一期呢？在語言學史方面，宋代學者的研究也是劃時代的。

首先，在古音學方面有吳棫的韻補，朱熹詩集傳間取其說爲叶韻之說¹⁷。此外，鄭庠又有古音辨一書，開始把古韻分爲六部；近代正式分列古音的韻部的，應當推始於鄭庠¹⁸。

其次，在等韻方面，現存的重要的韻圖也是宋元明代的產物，如韻鏡和鄭樵的七音略（十二世紀以前）；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和元代劉鑑的切韻指南等（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之間）；還有明代梅膺祚的字彙後面所附的韻法直圖和韻法橫圖（十六世紀）¹⁹。

復次，在訓詁學方面，有北宋王子韶（與王安石同時）的右文說²⁰，

17 清錢大昕韻補跋云：「世謂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才老博考古音，以補今韻之闕，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原本，而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辭以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人依聲寓義，唐人久失其傳，而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文公詩集傳間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

18 參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1963 年香港重印本），p. 264—267。

19 參王力中國語言學史第九節，中國語文 1963 年，p. 417。

20 宋沈括夢溪筆談十四：「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菱，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夂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菱爲義也。」